

《桃花扇》是孔尚任历时十余年,三易其稿完成的作品,甫一面世,就洛阳纸贵,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欢迎。全剧借侯方域、李香君离合之情,写家国兴亡之感,而其归结处被安排在栖霞山这一特殊的地理景观,饶富意味。

栖霞山又名摄山,位于今南京市栖霞区的中北部,距南京城东北约20公里,是茅山延伸到南京的北支,位置较为偏僻,六朝唐宋元之时,游览者少见,到明嘉靖、隆庆时开始逐渐为士人关注,旅游活动兴盛,明末清初,有大量的遗民逃入山中。孔尚任游历南京时,曾到过栖霞山,并拜访了道士张瑶星,他在《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》一诗中写道:“著书充屋梁,欲读从何展。数语发精微,所得已不浅。先生忧世肠,意不在经典。埋名深山巅,穷饿极淹蹇。每夜哭风雷,鬼出神为显。说向有心人,涕泪胡能免。”(《孔尚任诗文集》卷二)从中可见张瑶星虽为道士,但忧世之心犹在,因此当向人说起往事时,不免涕泪横流。张道士和栖霞山给孔尚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所以在创作《桃花扇》时,他选择以此人和此山收结,可算事出有因,但又不仅仅因此,还有着别样的寄托。

山岳在中国自古即有特殊内涵,最早如《山海经》所记,山中多有精怪,随着道教、佛教逐渐发展,宗教进入山林,名士也游览、隐逸山中,形成了山岳独特的文化内涵,它既在尘俗世界又与之保持距离,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。栖霞山当然也是如此。剧中人物汇聚栖霞山是在第四十出《入道》,时间为南明弘光二年(1645)七月。此时弘光朝廷已灭,金陵之



《桃花扇》与栖霞山

■何安平

地已为清兵占领,两个月前弘光皇帝半夜弃城而逃,众多大臣也逃之夭夭,城中百姓更不用说,李香君随苏昆生、蓝瑛到城东栖霞山避祸,侯方域与老赞礼也来到山中,并且都寄居在道观。侯、李最终相见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——七月十五中元节,这是道教的叫法,佛教称为盂兰盆节,俗称鬼节,是祭奠祖先、普度亡魂的民俗节日。作为明遗民,他们在此为明代皇帝和大臣举行“黄箒科仪”,即“救世祖宗”的黄箒斋,他们视明代君臣为“祖宗”,自然是与新的清王朝对抗,但也只能是一种仪式性表达,多少显得有些

悲凉。栖霞山本为佛教圣地,“古来与荆州玉泉、济南灵岩、天台国清,共称天下四绝名山”。(《摄山志》)孔尚任自然知道,他《游栖霞寺》诗就说:“有树皆松挂,无人不佛山。”(《孔尚任诗文集》卷二)在佛教名山之中,他却选择了道观道士,而非佛寺僧侣,来使侯、李醒悟入道,除与张瑶星相识外,或许也有叙事策略上的原因。因为佛教认为人生皆苦,故以死为解脱,而道教希求长生不老,对于普通遗民来说,并不需要以死来殉国,可能更希望在新朝能继续生存下去。而且最后忠臣成仙,奸佞

为神鬼所苦,也更适合运用道教的神仙观念来展现。

这场修斋活动能够举行,主要是由于栖霞山“人迹罕至、地方幽僻”的特殊地理位置,清军尽管攻入金陵,却还来不及进山搜查,栖霞山得以暂时保持平静,与外界隔离开来。孔尚任在此将栖霞山作为明王朝的象征,即明代的政治地理空间已无,所剩者唯有一座孤山,也可以看做是文化空间的微小残余,留给侯、李等人在这里聚集,哀悼先朝。然而栖霞山非世外桃源,不可能长久独立于新政权,由此不得不再有《余韵》一出。

《余韵》设定的时间已经是三年后的顺治五年(1648)九月,原先山中的那些文人名士,“都是识时务的俊杰,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”。三年前的文人名士当然都是明遗民,他们离开栖霞山,投入清朝的王庭中,预示金陵彻底陷落。这不仅是明朝军事的溃败,也是明文化的断裂,短暂存留的山中明文化空间就此被新的政治所笼罩。文士都已离去,剩下的是樵夫苏昆生、渔翁柳敬亭等,他们逍遥山水间,把南朝的兴亡旧事,付之闲谈,柳敬亭编一首《秣陵秋》弹词诉说史事丝毫不差,苏昆生编一套《哀江南》北曲放声悲歌。和所谓的文人名士相比,他们对于先朝似乎更有感情。《余韵》中,老赞礼还在世俗红尘忙着祭祀财神,但对于世间一切早就看透,正如他的《神弦歌》说的:“地难填,天难补,造化如斯。释尽了,胸中愁,欣欣微笑。江自流,云自卷,我又何疑?”三人喝酒畅谈时,一皂吏出场,他本是明朝贵公子,今是清廷一小吏。他入山而来,不是游山玩水,是奉清廷之命,搜寻隐藏山林不主动归顺的明遗民。苏、柳等不以山林隐逸自居,奈何皂吏正要访拿他们,只好各自逃走。

《余韵》一出被认为是“曲终人杳,江上峰青,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”(梁廷枏《曲话》)。这种言尽意不尽的表达效果与象征手法的使用密切相关,栖霞山象征还残留的明代文化空间,苏、柳等遗老可以在里面生活;皂吏象征清朝势力,它在政治稳定后,已开始清理前朝文化,即使隐藏在深山里,也要“访拿”殆尽。明亡清兴的历史就这样被孔尚任反映在栖霞山文化空间的变换中了。

刘峻字孝标,以字行,在中国文学史、学术史上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他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六年(462)出生于秣陵县,父亲刘琨之在他满一岁时就去世了,母亲许氏带着他和兄长刘孝庆回到家乡北海都昌县,在这里,刘孝标一直生活到八岁。

宋明帝泰始五年、魏献文帝皇兴三年(469),魏剋青州。这年五月,刘孝标母子随青州民被掠入魏,分配到中山为奴。他在《自序》中说自己“桑梓颠覆,身充仆圉”,就是此事。中山富人刘实(或刘宝)同情并欣赏他,以束帛赎之,教以书学。其后不久,刘孝标母子被北徙至代都平城。因生活贫困,母子三人一度出家为尼僧,不久还俗。

宋明帝泰豫元年、魏孝文帝延兴二年(472),云冈石窟寺沙门吉迦夜为昭玄统沙门昙曜译经五部一十九卷,刘孝标笔受,年仅11岁。“笔受”即用笔记述别人口授的话,一般包括对内容的整理连缀,往往还有对文字的加工润色。这是古代著述及佛典翻译中时常采用的方式,即所谓译经润文者也。刘孝标年十一,但已读书有年,颇具文字功底,具有了记录、整理乃至润色加工的能力。陈垣说:“自吉迦夜译本(《付法藏因缘传》)行,而昙曜译本(《付法藏传》)遂废。以今存昙曜译大吉义神咒经推之,昙曜所译,较为朴讷,不如吉迦夜译之文采,亦未可知。此与笔受人极有关,吉迦夜译笔受人为刘孝标,孝标固南朝著名文学家也。”(《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》)

魏孝文帝广延人才,江南人士有才华者都被提拔任用,而刘孝标兄弟不蒙选拔。齐武帝永明四年、魏孝文帝太和十年(486),刘孝标兄弟自魏地逃还京师。这一年他25

小时了了,大亦佳

——南朝著名文学家刘孝标的著述流年

■赵建成

岁,在魏共18年。南归后,刘孝标又广求异书,发奋苦读,他本极聪明,于是博极群书,文藻秀出,清河崔慰祖谓之“书淫”。

此后,刘孝标一直在京师苦读。永明十一年到齐明帝建武四年(497),刘孝标先后做过豫州刺史崔慧景、萧遥昌的刑狱参军,其后“久之不调”(《梁书》本传)。直到梁武帝天监四年(505),刘孝标44岁,被召入西省,为文德殿学士省学士。刘孝标校进文德殿藏书,编成《梁文德殿四部目录》四卷。

就在这一年,刘孝标请假省兄青州刺史刘孝庆,私载禁物,为有司所奏免官。但“私载禁物”只是一个官方的借口,这一年发生的“策锦被事”才是刘孝标被免官的真正原因。据《南史》本传:“初,梁武帝招文学之士,有高才者多被引进,擢以不次。峻率性而动,不能随众沉浮。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,时范云、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,帝乃悦,加其赏赉。会策锦被事,咸言已罄,帝试呼问峻,峻时贫悴冗散,忽请纸笔,疏十余事,坐客皆惊,帝不觉失色。自是恶之,不复引见。”也就是说,刘孝标被免官,深层原因是由于梁武帝的妒忌之心。

天监七年(508)冬,刘孝标作《广绝交论》,这是其名篇之一。任昉好交游,多所

引荐提拔,故当时衣冠贵游,莫不争相与交好,座客盈门。然其死后,诸子皆幼,流离不能自振,生平旧交莫有收恤。刘孝标见之,乃广朱叔叔《绝交论》,著此论以讥其旧交。《广绝交论》所论,具有普遍意义,但实际上又有明确的指向,即颇受其提携的到溉、到洽兄弟。据说到溉见其论,抵几于地,终身恨之。

最早在本年冬,刘孝标做了安成王萧秀的户曹参军,萧秀看重他的才学,供给书籍,使抄录事类,编撰《类苑》。天监十一年(512)十二月,萧秀调离荆州刺史任,梁武帝诏刘孝标还京掌秘阁图书,刘因病未能赴任。次年,刘孝标离开荆州赴东阳郡,于金华山首之紫岩山筑室隐居,作《始居山营室》诗,并继续编撰《类苑》。这一年或稍后,作《山栖志》,其文甚美。

天监十五年(516)前后可能是刘孝标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,这一年他55岁,《类苑》编成,凡120卷,费时近8年。《答刘之遴借《类苑》书》《辩命论》作于本年或稍后,并就后者开始与刘沼相辩难。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,即《世说注》的编撰工作,也应该自本年或稍早开始。

《类苑》共120卷,是一部“括综百家、搜撮群言、义以类聚、事以群分”(刘之遴

《与刘孝标书》)的大型类书。书未及毕时,已行于世(《梁书·安成康王萧秀传》),时人评价甚高。《类苑》的成书,很可能又触动了梁武帝敏感的神经,再度遭到他的妒忌,从此他再也不征召刘孝标出来为官,同时命诸学士何思澄、顾协、刘杳、王子云、钟屿等撰《华林编略》以高之。堂堂一代帝王,气度如此。刘孝标感慨自伤,乃著《辩命论》以寄其怀。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,二度往返,第二次的时间应该是天监十六年,值刘孝标“有天伦之戚”,即其兄刘孝庆卒,故其书未能及时送达刘孝标。不久刘沼辞世,有人自其家得此书以示刘孝标,刘孝标伤痛感慨,复作书答之,即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。然今可见此书之内容,除交代作书的背景,表达对刘沼辞世的伤悼之情外,并未对刘沼的辩难予以解答,实应为《重答刘秣陵沼书》之序。

梁武帝普通二年(521),刘孝标卒,享年60岁。门人谥曰玄靖先生。《世说注》完成于本年或之前。刘孝标的著作,除前文已涉及者外,还有《汉书注》140卷与《陆机《演连珠》注》,后者为李善《文选注》所采。

刘孝标《世说注》征引浩博,采用四部文献达475种,颇为后世所推。其价值也早已超越了自身的注释范畴,成为我们审视魏晋六朝社会、历史、文化的重要典籍。宋高似孙《纬略》评之“有不言之妙”、“实为注书之法”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将其列为四大名注之一。

刘孝标家本将门,其兄刘孝庆、堂兄刘怀珍、刘休宾皆为名将,而他本人学识渊博,实为一代高才。虽生前抑郁不得志,然其著述与人格,已光照于后世。